



中共党史译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1

革命年代

DH84/27
中共党史译丛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

求实出版社

中共党史译丛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625印张 146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600册

书号：3231·147 定价：0.83元

(内部发行)

编 辑 说 明

为了向党的宣传理论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提供国外有关中共党史的反映、报道和研究情况的参考资料，我们编辑了这本《中共党史译丛》。

这一辑的文章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九八二年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通讯》（现已改名《党史通讯》），这次汇编成书之前，又请译者作了校订。这些论文、资料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请同志们读时加以分析。

我们编辑《中共党史译丛》是一种尝试，在选材和编辑方法上都缺乏经验，敬请读者提出批评，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斯诺著《中共杂记》选译·····	(1)
一、周恩来同志一九三六年七月和斯诺的 两次谈话·····	(1)
二、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九月和斯诺的谈话···	(11)
三、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看法·····	(27)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 [美]雷蒙德·F·威莱	(35)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 ·····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66)
日本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 ····· [日]山田辰雄	(118)
北伐时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路线形成考····· [日]永野英身	(143)
从胡汉民访苏看共产国际如何重视国民党 ····· [加]巴雷特	(176)
托派分子彭述之关于中国大革命问题的谈话 ····· [日]中岛岭雄	(190)
评关于江西时期的几本西方著作····· [美]黄宗智	(208)

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表的关于 西安事变问题的两篇评论文章	(233)
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社论： 在中国发生的事件	(233)
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评论员文章： 国际评论（一）	(237)

斯诺著《中共杂记》选译

编者按：这里刊载的三部分材料，原是埃德加·斯诺1957年整理出版的《中共杂记》一书的《第九章 周恩来》、《第十一章 毛泽东》和《第十九章 罗斯福总统论中国》三个部分。这部书保存了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珍贵资料，但国内目前尚未正式出版，现参照某些译文将以上三章译出，以供参考。

一、周恩来同志一九三六年七月 和斯诺的两次谈话

1、谈蒋介石

我在陕西白家坪的一个窑洞里住了两天，周恩来就住在隔壁。当时周曾同我谈话，并帮我拟定了一个旅行日程，他说这个旅程可使我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控制区的情

景。白家坪那时是离西安最近的一个红色前哨，是个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中心，有一部手摇军用电台，还有一个通信站，向西走一天就到红色“首都”（保安）。下述对周恩来的访问记未收入《西行漫记》，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后，正在我写这本书时，周捎信给我（当时在北平），要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由于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在西安建立一个联络总部，由周恩来负责同蒋介石谈判。如果我引用了他的话，恐怕会给他所担负的这一任务带来麻烦。这颇耐人寻味，因为他的谈话可能表明，在周恩来同我谈话时，周本人和共产党并未打算把蒋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而是考虑建立一个由蒋介石的叛逆者参加的既反蒋又抗日的统一战线。

关于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1954年我在《星期六晚报》上已尽我所知撰文详加报道，故关于他们的一些传记材料，这里从略。

1936年7月9日 白家坪

斯 诺：“1927年反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人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我们主要的错误，毫无疑问是没有在农民中深入开展革命，尤其是在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的广东和广西（？）地区没有这样做。我们党在这方面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发展只求面广（即扩大数量），而不求深入（即不直接从农民中组织战斗力量）。

“其次，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致使许多优秀军官脱离了我们。如果我们大力争取这些军官，1927年征集和装备十个师的共产党部队还是可能的。

“再次，由于策略上犯错误，我们丧失了掌握当时还是革命的国民党的机会（缅甸共产党犯了几乎相同的错误——原注）。举一个例子：在上海，我们没有成功地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失去了理应属于我们的对国民党的控制权。1926年3月以后，如果执行正确的策略，我们是可以取得这种控制权的。那时国民党中所有右派分子已暂时被驱逐出领导层；左派分子汪精卫正同我们密切合作；当时的中派蒋介石已被孤立。如果共产党全力到国民党里面去争取领导权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面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同国民党左派结成联盟，取得并保持领导权（这是含蓄地批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策略性领导吗？——原注）。当时军队、商人、学生以至华侨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

“最后，当蒋介石进军上海期间，我们仍然有时间组织一种联盟以对付蒋和右派分子。蒋当时并未掌握军队中的主要领导权。参加北伐的有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所有这些部队都不由蒋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这三个师又是最靠不住的。”

问：“您如何解释这样的错误或错误估计呢？”

答：“有几方面的原因：中国缺乏经验和马克思主义

传统，我们党才成立了几十年。其次，党本身的领导成员分裂了，一方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陈独秀，另一方是一批刚刚出现的通晓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再次，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集团之间革命发展不平衡。最后，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缺乏经验，而小资产阶级分子一直成功地掌握着党的最高权力。”

问：“您认为反映这一革命时期的书哪本最好？”

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在江西的一位党员写的，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

问：“您对目前局势乐观吗？”

答：“中国革命现在正接近另一次高潮，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抗日运动取得政权是可能的。在不久的将来成功与否，取决于群众运动的发展状况，取决于作为原动力的群众如何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虽然革命农民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获得粮食和土地，但接着就是全民族抗日问题。1935年（？原文如此。应为1936年初——译注）农民之所以热情欢迎红军远征山西，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拥护这一口号（抗日）。”

问：“您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答：“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迅速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

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在国民党上次代表大会上，他因为怕受到谴责，甚至连反共的口号都没敢提。”

周恩来雄辩地说，蒋介石企图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所有地区，因而兵力越来越分散，正由于这样，他在各地的力量也就随之削弱了。“他现在的弱点就是缺乏集中兵力的能力。”从求得政治上的真正巩固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占的地盘也太大了。

周接着说：“如果蒋介石允许红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最终会证明他再想象当年在江西那样集中兵力向我们进攻是不可能的了。他现在既不能阻止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也不能阻止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如果抗日运动发展，蒋几乎肯定会丧失其独裁统治。他的军队既不象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强，那么集中，也不象那时那么可靠了。一旦抗战爆发，抗日力量（即红军）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心里也明白，抗战爆发的第一天，就标志着他的独裁统治的崩溃。毋需列举国民党军队中哪些将领和部队会首先发动反叛。不过，其最得力的指挥官之一的陈诚，对反共战争没有什么热情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南更不热心。这两人原都是黄埔军校的左派学员，也是许多红军领导人从前的同志。两人都是爱国的，蒋不可能长期地依靠他们进行独夫的反共战争。如果抗日战争爆发，几乎可以肯定他

们俩会支持统一战线。”

问：“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作何评价？”

答：“评价不那么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靠猛攻夺取阵地。1927年（应为1926年一编者）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

“在南昌，蒋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蒋介石拥有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一师，但他只用第一师。叶剑英（现任东线红军参谋长）当时指挥第二十一师。蒋介石的愚蠢使他感到厌恶，不久就辞职而去。

“最近在山西战役期间，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的兵力进攻和歼灭红军。陈还是个不错的战术家，因为怕遭伏击，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我们截获了陈致蒋的复电。我们倒是的确欢迎他们这样集中兵力。去年（1935年）12月，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将张学良部六千人解

除武装。对南京说来，幸好蒋介石并不经常亲临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问：“您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是谁？”

答：“陈诚是个不错的稳重而实干的人，但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也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曾对红军进行过最有力的战斗。何应钦从前是个不错的指挥官，但是1927年他因为遭到惨败（败于孙传芳？）而吓破了胆，锐气大减，从此在战场上就一蹶不振了。”

问：“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部队对十万红军正规部队），对红军逐步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重要力量。我们本来是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合作的，但由于听从了李德（红军的德国顾问）和上海（共产国际）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作，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抄十九路军而把它打垮。”

2、陕西和江西

周恩来说：“陕西的农民极其贫困，土地非常瘠薄。如果江西农民拥有象陕西农民那样多的土地，就会被认为是很有钱的地主了。江西红军兵工厂每月生产五十万发炮弹（子弹？）而这里生产很少。江西还能大量制造手榴弹，陕西的产量则很低。江西苏区人口达三百万，这里（三省部分地区）最多有六十万。在江西和福建，人民参加红军是带行李的；而这里人民参军身上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他们简直一贫如洗。

“最近，红军在绥远省边区盐池县攻占两大块租借地。这两块地方近百年来一直属于法国和比利时神父，面积约五百平方华里。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由于一群蒙古人杀害了两个传教士，这两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属于法比神父了。这片辽阔的土地环抱着盐湖，如今所能见到的房屋均属于教会。这个地区有三十来座大大小小的礼拜堂和许多富饶的葡萄园。蒙古人来这里取水、买酒和放牧。

“我们到这个地区后，与传教士达成一项协议。教会财产的所有权暂时保留不受侵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反过来传教士答应和国家分享这两块土地上的粮食和财富，遵守苏维埃法律，不透露有关红军的消息。这项协议一直遵守得不错。传教士们同意向全世界、特别是向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据说他们是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

者，并且受到法国人民阵线的影响。他们还代我们（共产党）发电报祝贺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

3、谈未来的计划

1936年7月10日 白家坪

周恩来说：“目前红军面前摆着两个可能实行的战略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实现都有待于从南方来的部队（由朱德、贺龙、张国焘统率）与此地彭德怀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将于七月末或八月初在甘肃南部会合，这是分手一年后的重新会合。去年当毛泽东、彭德怀（还有周恩来）向陕西进发时，中央在西北发展力量的计划遭到张国焘的反对。他坚持留在四川，企图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回师南下。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人知道，政府军早已在他们的背后构筑工事，并向贵州、湖南调进大量增援部队。他们认为回到南方根据地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失败。直到南京方面的部队在懋功地区发起进攻，把红军切为两部之时，中央还在争论不休。朱德、张国焘同其他部队断绝了联系，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朱德不同情张，但因他的部队处于张的部队之后，他被张抓起来了（按：此点与事实不符，当是笔误或出于误传，朱德同志当时没有被逮捕——译者）。一年之后的今天，张国焘同意了向西北进军计划，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西南局势不稳，牵制了

很大一部分南京方面的部队，迫使他们调出四川，张利用这种有利形势，正在率部进入甘肃。部队会师后，将召开会议讨论以下两项战略计划：

“一、向南向东发展，进入甘肃南部，最后进抵河南。如有必要，红军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反对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样还可以形成一个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蒋抗日力量的中心，其枢纽部也许在潼关。这项计划要在抗日的口号下进行，张学良是否会在抗日运动中投向共产党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将根据对红军会师后实力的估计，人民对统一战线的支持情况，以及同其他力量会合时总的政治形势，再来决定是执行这项计划还是执行下述第二个计划。

“二、进入绥远和内蒙，迅速同日军直接交战。这个行动会引起同宁夏和甘肃穆斯林军阀的武装冲突，我们力图将内蒙古王公（Princes）争取过来，并争取群众支持抗日统一战线。这意味着要同绥远的傅作义发生战斗。并穿过外蒙，建立红色中国和新疆之间的交通线。这个方针能够使红军建立起一个足以独立进行抗日战争的强大根据地，如果政治形势有利的话。”

同年9月29日，我同德国顾问李德谈起上述两个战略计划，他说，红军将向西移动，经兰州以北夺取宁夏。这多半“要在两个月以后才能进行”。那时，三个主力军团已经会师，并得到休整、改编和新的训练。他这个说法引人注目，主

要是因为透露出红军当时（西安事变前）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在同苏联接壤的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站住脚。

我同周恩来的上述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周的英语虽不流利，但明白易懂。我把他的话全部记下来，然后念给他听，纠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帮他去掉一些费解的字眼，最后修改定稿。这篇访问记就是从其中摘录下来的。

二、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九月和斯诺的谈话

1、几句题外话（1939年回到陕西）

1939年9月下旬，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星期后，我回到延安。当时周恩来已飞往莫斯科，表面上是为了寻求苏联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旨在搞清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斯大林的新方针。我受到两次正式接见，由王汝梅（现名黄华）任翻译，问答都作了记录（谈话曾全文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1940年1月13日、20日；又见于《亚洲的战争》，纽约1941年版，第280—302页）。黄原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个青年领袖，1936年我从北平带他到保安。在正式接见前，我曾同毛共进晚餐，进行了一次私下漫